

古代名人“高考”趣闻

高考,或者类似的考试,古往今来都是备受关注的焦点,也是诸多“谈资”的来源。古代的名人,当年在考试中都有哪些趣闻呢?黄一鹤在《段子里的中国通史》(光明日报出版社,2013年6月出版)一书中,讲述了古代名人的“高考”故事。从中可见,无论登第还是落榜,都要有平常心。

“玩儿”大了

唐末举子包谊文采不错,但得罪了主考官刘太真。刘太真发誓不让包谊考中,第一场考试过后,刘太真想第二场考试再将包黜退,让他多高兴会儿。第二场考试后,刘太真又放他到第三场,想让他再高兴一会儿。第三场考试后刘太真没录取包,拿着名单去找宰相。时值“朱泚之乱”不久,名单中有个姓朱的,宰相不高兴,让刘太真换人。惊惶之下,刘太真已经想不起其他举子的名字,只记得包谊,结果包谊高中。

“文良颜丑”?

唐朝人才辈出,但选才标准却有点怪。《选举志》提出的标准是:一曰身,就是体貌丰伟;二曰言,就是言辞辩正;三曰书,就是楷法道美;四曰判,就是文理优长。这四条标准,一是看长相,二是看语言表达能力,三是看书法,最后才看文章。诗人罗隐就因此吃了亏——他诗写得不错,但长相却让人不敢恭维,因此屡试不第。

“这题我做过”

晏殊从小天资聪慧,后被推荐去见宋真宗,恰好宋真宗在面试进士,就让他也参加。晏殊一见试题,就说:“这题目我几天前做过,您还是换个题目吧!”宋真宗欢喜得不得了。晏殊就这样进入高层,成了宰相。

“走后门”不通

韩愈19岁参加进士考试,连考三次,次次不中,到第四次才考中。别以为万事大吉了,要成为“公务员”,吏部那里还要考一次,韩愈又连考三次,次次不中。考不上就走后门,给宰相写信,连续三封石沉大

海。又登门拜访,三次上门次次被轰回来,走后门不行,回来接着考,32岁才考上了。

殃及池鱼

明朝成化年间,浙江学政李贤在省试时微服私访,看到有两名考生在下棋,一考生甚至大言不惭地说:“用不着复习,上榜没问题。他李贤总不能出道含有100个人名的怪题来刁难我们吧?”李贤无名火起,回去后真出了这道怪题:“孔门七十二贤,贤贤何德?云台二十八将,将将何功?”结果没人能全部说明,李贤因此一个都不录取。

公然“作弊”



欧阳修 资料图片

欧阳修考试,有个姓李的考生生病,趴在桌子上不动。欧阳修就把李考生拽起来,给予精神鼓励,还把自己的试卷传给那位考生看,让他参考。李考生就抄袭了欧阳修试卷的一半,结果和欧阳修一起考中。李考生后来成为官员,找人专门雕塑了欧阳修的塑像,放在家里供着。

“走后门”登第

王维参加考试,想走后门无门,



韩愈 资料图片

听说公主喜欢音乐,于是穿上花花绿绿的衣服,打扮成乐师,抱着琵琶去见公主,被公主相中,一举而登第了。

巧过“中彩票”

福建同安县的刘望龄,在明朝末年参加考试,中了福建省乡试第34名,后因故被革。进入清朝后,再次参加福建的乡试,又是中了第34名。隔朝两中举人,名次相同,这个概率比今天中500万元的彩票还低。

无巧不成书

清时陕西乡试,一位主考大人赴西安做考官,临行前拜访官至尚书的恩师。两人谈话间尚书想放屁,但又不好意思,移了移屁股,主考官以为有玄机,立马问有啥吩咐。尚书说:“无他,下气通耳!”意思是说“没啥,只是放了个屁”。主考官理解错了,以为要录取一个叫“夏器通”的考生,阴差阳错得了个第一名。

下笔太快

蒲松龄有一次参加考试,拿到考题时,觉得这题太简单了,奋笔疾书,书完一看“越幅”了,就是第一页做完后,直接翻到了第三页做,这是没法补救的。糟了,又考不上了。

据《羊城晚报》

历史知识

古代“高考”也“封卷”也有“少年班”

现在高考规定有严格的封卷制度,以防止考试阅卷出现人为弊端。实际上,这种封卷制度在古代“高考”就早已有之。

史籍记载,我国古代科举封卷制度起始于宋朝。据《宋史·选举》说,宋太宗淳化年间,为“革考官窝私之弊”,采用监丞陈靖的建议,推行“糊名考校”法,科考时在试卷上糊住考生姓名、籍贯,决定录取卷后再开拆弥封。追溯起来,“糊名考校”法显然当算是高考封卷制度的“始祖”了。

不过,在封建官场腐败的情况下,即便实行考卷弥封制度,还是有不考官凭借辨认考生字迹作弊。于是,在宋大中祥符八年,真宗赵恒下令设誊录院,由书吏誊抄科考试卷,考官藉誊抄副本评卷。此种做法,把考试封卷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
每年的高考,几乎都会传出有低龄高分考生被重点院校破格录取的消息。前几年还有学校开设“少年班”,专门网集“神童”加以重点培养。

然而,对“神童”实行特意培养并不是今人的创举,大量史料说明,中国自古就不乏“神童”,而古代各朝对这些“神童”也是格外重视,一旦发现,就要着意加以培养,并引为皇朝幸事。

史学有记,早在汉时朝廷就选拔了一些年龄在12岁以下的“奇童”在太学读书。唐代科举则专门设立了童子科,只要是年龄在10岁以下,能通一《经》及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每卷能诵文十通者,就可以入“科”,给予身份。当然,由于年少不经事,他们虽有功名,却不能去治民。

而在宋朝,童子科还“录取”过女孩。宋淳熙元年,有个叫林幻玉的

女孩,在中书省应试,主考官挑试诗书43件,全部通过,为此,孝宗皇帝特地封她为“孺人”。

元代也曾规定,凡童子科中试者,一律“录取”到朝廷的最高学府国子学里加以重点培养。

据《合肥晚报》



延伸阅读

古代最后一次“高考”

看几遍军旅作家王维的《末代状元张謇(jiǎn)》,也没有弄明白作者为什么把张謇说成是末代状元。因为在张謇后面还有骆成驥、夏同龢(hé)、王寿彭、刘春霖四位状元,末代状元应该是刘春霖。

江苏海门市长乐镇(即今常乐镇)人张謇成为光绪二十年(1894年)甲午科的状元,当年的榜眼是湖南省茶陵县人尹铭绶,探花是湖南长沙人郑沅。这次考试后的1895年,荣禄、陶模等人上书变通武举,建议以武学堂取代武举培养和选拔人才。也就是在这一年,李提摩太提出在科举考试中增加新的科目。他认为:“中国科目,意美法良,不可废也。”但“惟题目不广,只讲本国之事,不知各国治平之法”,应该改革。

第二年,即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,由徐桐、启秀、李文田、唐景崇任主考官,科举考试仍在进行,四川资中人骆成驥成为当年状元,浙江黄岩人喻长霖、湖南省湘乡县新安乡三十四都(今双峰县三塘铺镇)人王龙文分别是榜眼和探花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十一月,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考试时设立经济特科,选拔“或周知天下郡国利弊,或熟谙中外交涉事件,或算学律学,擅绝专门,或格致制造,能创新法,或堪游历之选,或工测绘之长”的人才。康有为也在这一年撰写了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》一文,指出用八股取士,致使出现“巍科进士,翰苑清才,而竟不知司马迁、范仲淹为何代人,汉祖、唐宗为何朝帝者,若问以亚非之舆地、欧美之政学,张口瞠目,不知何语矣”。但他们说归说,科举考试并没有停止。

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,贵州麻哈州(今麻江县)人夏同龢中戊戌科状元,湖南桂阳莲塘大湾人夏寿田是榜眼,浙江德清人俞陛云是探花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两广总督陶模率先提出“废科举以兴学校”,作为“图存四策”之一。戊戌变法时,康有为建议:“请勿下部议,特发明诏,立废八股。”清廷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,慈禧太后只是重新恢复了被废止的经济特科。1903年癸卯科考试正常进行,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由孙家鼐等四人任主考官的科举考试。山东潍县(今潍坊)人王寿彭高中状元,山东莱州人左霁、贵州遵义人杨兆麟分别中榜眼和探花。

紧接着的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以裕德、张百熙、陆润庠、戴鸿慈为主考官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,河北省肃宁县人刘春霖一举夺魁,成为清朝末代状元,广东清远清城区人朱汝珍、广东番禺人商衍鎏分别成为末代榜眼和探花。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(1905年9月2日),直隶总督袁世凯、盛京将军赵尔巽、两广总督张之洞、两江总督周馥、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会奏《请废科举折》。指出“科举一日不停,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,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”。呼吁停止科举已是迫在眉睫之事。清廷接受了来自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的建议,决心废除科举考试,以达到延续自身统治的目的。自此为止,具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这中间有的人一边高喊废除科考,一边又不停地参加着科考。徐世昌和袁世凯曾誓言废除科考,但徐世昌还是参加了科考,并中光绪十二年(1886)的进士。好在袁世凯并没有放在心上,两人关系依然很好,在玩弄清政府和孙中山的道路上,相互协助,一唱一和。相比之下,梁启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,他和吴稚晖等人约好不参加考试,但梁启超还是在父亲梁宝瑛和老师康有为陪同下分别参加了1890年和1895年的会试,最后虽然因为主考官徐桐以广东举人考卷中“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”为由没有录取,但还是导致了吴稚晖和梁启超终生不相往来的结局。

据《海南日报》